

我们是谁？威尔逊、一战与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

王立新

摘要：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新形势下，威尔逊借助美国卷入大战和实施战争动员这一难得的时机，通过重新阐释美国的传统与特性以及利用德国作为“他者”与美国相对照，成功地使美国的自我形象与国际角色从19世纪的“共和榜样”和“自由典范”转换为“自由卫士”和“世界领袖”。威尔逊对国家身份的重塑不仅有助于当时的战争动员，而且解决了美国踏上世界舞台后的角色困惑与身份危机，为崛起的美国确立了长远的国家政策走向。他对美国理想、角色和命运的创造性阐释主导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存在的意义以及美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话语，对美国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威尔逊 国家身份 国际角色 美国外交

一、总统、战争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

同个人和其他群体身份一样，国家身份是“想象出来的自我”，^①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国家身份的建构性质决定了国家身份并非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变化的。一个国家会根据自身的变化、环境的需要和不同“他者”的出现对“自我”进行重塑，从而使国家身份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身份的塑造实际上是一个对自我和他者进行解释和再解释的过程。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作为一个没有统一的族群特性，缺乏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又以反叛的方式进入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我们是谁”、“我们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美国经常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正如比尔·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说的那样，“每一代美国人都必须界定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②通常说来，一个国家的族群构成、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实力等方面的变化会导致国家自我理解的变化，并进而导致国家身份的改变。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70118)“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1775—2005)”阶段性成果。

①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② Bill Clinton, “American Renewal,”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vol. 59, no. 9, Feb. 15, 1993, p. 258.

在美国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总统通常处于非常有利的,甚至独一无二的地位。总统是美国唯一由全民参与选举出来的公职,在理论上也是唯一向全体美国人负责的民选政治家。总统不仅影响、甚至左右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同时其言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这使总统往往成为阐释美国自我,说明国家存在的意义、特性与目标的不二人选。总统也常常通过阐释美国传统、塑造美国的国家身份来加强对国家的领导,论证具体政策的合法性,因为统一的国家身份意识有助于在美国这个多元社会里弥合分歧、凝聚共识和形成共同意志,从而增强国家采取统一行动的能力。就对外关系而言,如果总统能够清楚地提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并为公众所接受,从而形成在国际角色与身份问题上的共识,那么美国就能比较容易地制定出连贯一致的对外政策。否则,美国的对外政策通常就会出现波动和摇摆。实际上,总统的很多政策主张和公开演讲都具有塑造国家身份的功能。^①

国家身份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发明过程。一个国家的领袖人物为了培育公民的国家身份意识,通常会发明一种关于该国是什么样国家的话语,并将其灌输给公众,让公众接受。这种话语也构成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关于国家特性与存在意义的霸权性话语,主导着一个国家的自我理解。当然这种建构并非是随意的,而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通常为这种建构设定了范围。在美国,总统对国家身份的建构通常是把时代需要、当前的环境与国家传统联系起来,然后加上自己的创造性解释,以此来发明一套公共话语,阐释美国的国家特性与身份。

在发生战争或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刻,申明强有力的国家身份和目的感就显得尤为重要,统一而强烈的国家身份意识会推动国民做出自我牺牲。在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对国家身份进行调整和重构,以适应战争动员的需要。此时,国家领导人会大谈国家的传统、理想和目标,以激发国民的牺牲精神。实际上,对外战争往往为总统提供了一个对公众进行教育、向公众灌输某种身份意识的难得“时机”。正如学者罗伯塔·科尔斯所言:

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言说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包括那些没有参加实际战斗的人界定国家特性和合法化国家存在的手段,并因此发明或复兴一种集体身份。……不论结果如何,战争动员实际上为总统提供了一个“可教的时机”(teachable moment),一个阐明特定的国家特性的机会,通常认为这种特性使该国与众不同。通过这种方式,总统也就让国家的成员接受了对其集体身份的阐释,界定了作为个人他们是谁,作为集体他们在国际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②

在美国国家身份塑造过程中,伍德罗·威尔逊处于极为关键的地位。作为一位在美国历史转折时刻出掌大位的学者型总统,威尔逊利用独特的总统身份和高超的修辞技巧,通过重新阐释美国的立国原则与核心价值观,表达了他对美国特性、国家理想和美国国际角色的崭新理解,并将其灌输到美国人心中,为新时代的美国塑造了一种新的、极富远见的自我形象和国家身份。威尔逊对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成为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对美国自身及其国际角色的理解,不

^① 学者玛丽·斯塔基认为,“当总统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应该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总统实际上也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一直是怎样的人民,我们将如何走向未来。他们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并且隐含着谁不是‘我们’中的成员”。Mary E. Stuckey, *Defining Americans: The Presidency and National Identity*,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 p. 9.

^② Roberta L. Coles, “War and the Contest over National Identit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0, no. 4 (November 2002), pp. 588-589.

仅激励了同时代的美国人，而且影响了他身后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

这里的“美国国家身份”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对内而言，指不同族群的美国人具有的共性或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构成美国的国家特性和一个人成为美国人的本质特征；二是对外而言，指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决定了美国在世界舞台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国家身份的这两个方面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不同美国人拥有的共同性往往也正是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独特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追求的目标和扮演的角色。

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威尔逊的公开演讲，考察威尔逊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情况下如何借助一战这一“可教的时机”，对美国的国家身份进行重塑，以及这种重塑对20世纪美国对外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①

二、美国的崛起与国家身份危机

美国建国后的100多年时间里，美国人在美国的国家特性和国际角色问题上有着高度的共识。美国是与腐败、专制、压迫的欧洲截然不同的新国度，是代表美德、自由和平等的共和国，是那些在欧洲遭受宗教迫害和政治压迫的人们的“避难所”。^② 而由欧洲君主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是险恶的，卷入国际政治会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把美国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和反复无常的罗网里去”。^③ 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可以避免其卷入外国（欧洲）事务，与国际政治保持距离，而专心致志地在北美进行伟大的共和试验，成为耀眼的灯塔和自由的榜样，让世人去仰望和效仿。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告诫国人“要与所有国家和平与和睦地相处”，“为人类树立一个高尚的、崭新的始终由崇高的正义和仁爱指引的民族的榜样”，而不要“卷入变化无常的欧洲政治中去”。^④ 托马斯·杰斐逊在第一任就职演说中也提出，美国的政策是“与所有国家和平相处、开展贸易和保持真诚的友谊，但不与任何国家结盟”（*entangling alliance*）。^⑤ 华盛顿和杰斐逊等人提出的外交思想成为所谓的“伟大准则”（*the great rule*），为后来的美国政府所奉行。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1年

① 学术界关于威尔逊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威尔逊外交与国际秩序思想及其影响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鲜有论著涉及威尔逊重塑美国国家身份的问题。只有两篇论文与本文研究的主题相关，并给笔者以启发。但两篇论文未能将威尔逊对美国国家身份的塑造置于美国崛起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分析，对威尔逊的塑造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也语焉不详，关于威尔逊如何重塑美国国家身份的看法与本文也颇有不同。这两篇文章分别是 James R. Andrews,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Woodrow Wilson and the Meaning of America,” in Leroy G. Dorsey, ed., *The Presidency and Rhetorical Leadership*,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29-144; Jason C. Flanagan, “Woodrow Wilson’s ‘Rhetorical Restruct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Self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rman Enemy,” *Rhetoric and Public Affairs*, vol. 7, no. 2, 2004, pp. 115-148.

② 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详细勾画了独立后美国的避难所形象。参见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2—23、37页。

③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Sept. 17, 1796, in Henry S. Commager, ed.,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58, vol. 1, p. 174.

④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Sept. 17, 1796, Henry S. Commager, ed.,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1, pp. 173, 174.

⑤ Jefferson’s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801, Henry S. Commager, ed.,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1, p. 188.

7月4日独立日演说中的一段话被普遍认为反映了那个时代美国人对美国国家身份的定位:

美国不要到国外去寻找恶魔加以消灭,她真诚希望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和独立。她将只是自身自由与独立的捍卫者和支持者。她将通过声援的方式和树立典范表现出的仁爱的同情来支持这一普遍的事业。她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投入到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旗帜之下,即使这是争取独立的旗帜,那么她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个人的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标准而进行的战争之中,并失去拯救其他国家的力量。……她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独裁女王(dictatress)并失去自己的精神。(黑色字体为引者所加)^①

也就是说,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是做“自由的灯塔”和共和的“典范”,而不是卷入国际事务中去维护“正义”或充当其他国家权利的“捍卫者”。在早期的美国精英们看来,把美国建成一个“榜样”和自由的“避难所”就是对人类自由事业的贡献。富兰克林曾说过,“在美国为热爱自由的人们准备一个避难所的前景就会使人们普遍感到欣喜”,^②而为了阻止人民大量移民美洲,欧洲的专制君主们“必须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因此美国人“在捍卫我们自己自由的时候也是在为他们的自由而战”,“我们(美国)的事业是整个人类的事业”。^③

从建国到19世纪末,华盛顿和亚当斯等人的告诫一直主导着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特性与国际角色的理解:美国是与欧洲君主制度和帝国截然不同的共和国,美国的恰当角色是充当人类的榜样,提供不同于欧洲的另一条道路,供世人效仿,而不是卷入国际政治或试图改变世界。

美国的这一角色认知既源于自殖民地时代逐渐形成的身份意识、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也与美国自身的实力有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弱国的世界观和身份观。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崛起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和头号经济强国,从而引发了对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国际角色的重新思考:什么是美国的国际身份?美国究竟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

尽管很多人继续坚持华盛顿和亚当斯为美国所规定的角色,但一些具有国际眼光的美国人已经开始怀疑这一角色是否与美国的大国地位和新的世界形势相适应。卸任不久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于1898年3月2日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美国的国际孤立》的演讲,主张美国应该抛弃华盛顿的“伟大准则”,扮演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角色。他引用华盛顿本人的话论证说,华盛顿提出孤立原则是因为美国当时“年轻而弱小”,必须利用自己“遥远而隔离的地理位置”避免卷入欧洲的争吵之中,以便为自己“赢得时间”,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制度,毫无干扰地积累足以让美国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实力和毅力”。而现在,在奥尔尼看来,“美国已经赢得了时间……它不再虚弱无力,也不再缺少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因此,(华盛顿)告别演说的准则不再适用于目前的形势”,美国不能继续奉行“孤立”的原则,满足于充当“榜样”,“不光彩地”“逃避大国应该承担的和崇高地位赋予(美国)的责任”。^④奥尔尼称,放弃华盛顿的“伟大

① Walter LaFeber, ed., *John Quincy Adams and American Continental Empire: Letters, Papers and Speeches*,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Inc., 1965, p. 45.

② Franklin and Deane to 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 March 12, 1777, in Francis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9, p. 287. <http://memory.loc.gov/cgi-bin/ampage>. (2008年12月7日)

③ Franklin to Samuel Cooper, May 1, 1777, in Francis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p. 313. <http://memory.loc.gov/cgi-bin/ampage>. (2008年12月7日)

④ Richard Olney,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tlantic Monthly*, vol. 81, no. 487 (May

准则”并不意味着一定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而是意味着采取支持其他国家的行动。他说：

这个国家有必要认识到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自己在世界列强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它应该接受属于它的优越地位，既享受它的好处，也承担这种地位带来的责任。仅仅夸耀自己的伟大和优越，让其他国家去羡慕和感动是不够的。在不幸的民族面前树立一个美国制度优越的榜样也许是正当的和有用的，但仅仅树立榜样就好比有人向你乞讨的时候，你吩咐人家赞美你的阔气、好看的衣服、漂亮的房子和舒适富裕的生活条件。他也许应该那样，并感谢你向他展示这些，但是他真正想要的和需要的是一只援助之手。这个国家的使命（如果它有的话，我确信它有）不仅仅是做出榜样，还应该行动。^①

那么美国应该如何去行动呢？什么是美国应该扮演的大国角色呢？以西奥多·罗斯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艾伯特·J.贝弗里奇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主张，美国应该建立强大的海军，攫取海外殖民地，把美国建成英法那样强大的帝国。洛奇1895年3月在参议院演讲中称，“现代潮流就是人口和土地向大国集中”，“伟大的民族为了未来的扩张和目前防务的需要正在迅速地兼并地球上未开发的地区”，而“小国属于过去，没有未来”，“作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之一，合众国决不能在前进中落伍”。^②贝弗里奇在1898年4月的演讲中也宣称，“同英国一样，我们要在全世界设立贸易站，我们要让我们的商船队驶向各大洋，我们要建立一支与我们伟大国家相匹配的海军，广大的殖民地将在我们贸易站周围发展起来，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秩序、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国旗将在血腥与黑暗的地方扎下根来”。^③正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兼并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加入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对海外殖民地的角逐，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殖民帝国。

帝国主义者实际上是试图让美国放弃对传统身份与角色——仅仅做“自由的灯塔”与人类的“榜样”——的执著与恪守，参与到世界政治中去，成为欧洲那样的帝国。就像贝弗里奇在1898年9月演讲中所说的，“如果英国能统治国外的领土，美国也能；如果德国能统治国外的领土，美国也能；如果它们能监督被保护国，美国也能”。^④

在他们眼中，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这一强国跟其他强国没什么两样，美国不是独一无二的美德化身，它应该根据国家利益和均势原则来界定自己的国际角色。这些人大多是具有世界眼光的精英，他们密切关注国际事态的发展，把奉行帝国主义政策视为大国俱乐部成员身份的标志，而占领菲律宾则是加入这一俱乐部的人会议式。也就是说，他们试图通过认同于欧洲的行为规范和国际流行时尚来获得国际社会中的大国身份。^⑤正如社会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个人有时是通过效仿某种榜样角色或学习某一群体的行为方式来实现身份与角色认同的，国家

1898), pp. 581, 582, 587.

① Richard Olney,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 587.

② Henry Cabot Lodge, "Our Blundering Foreign Policy," in Richard Hofstadter, ed., *Great Issues in American History: A Documentary Recor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8, p. 191.

③ Albert J. Beveridge, "The Role of Trade," April 27, 1898, in Richard W. Leopold and Arthur S. Link, eds., *Problem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Prentice-Hall, Inc., 1952, p. 601.

④ Albert J. Beveridge, "The March of the Flag," in Avery Craven, Walter Johnson and F. Roger Dunn, ed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51, p. 638.

⑤ 知名学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欧内斯特·梅指出，“世界舞台上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国际流行时尚可能对美国权势集团中的人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外国的行为提供了（他们）效仿的范例”，这些人“既属于美国，也属于更大的大西洋共同体的一部分”。Ernest May, *American Imperialism: A Speculative Essay*, New York: Atheneum, 1968, pp. 228-229.

也是如此。对这些渴望为美国赢得大国身份的人来说，在对外关系和国际角色方面让美国欧洲化，也就是像欧洲帝国那样行事，是带领美国走出孤立主义，确保美国大国地位的必由之路。正如学者弗兰克·宁克维奇所言，“帝国主义通过确保这个国家的新地位和处于文明前沿的位置，可以为美国提供一个清晰的国际身份”。^①

但是，西奥多·罗斯福等帝国主义者推行的政策与追求的国际角色——把美国打造成欧洲那样的帝国——与美国人的自我理解，或者说，与美国关于自己国家身份的元叙事^②是矛盾的。自从殖民地时代起逐渐形成的关于美国国家身份的元叙事是这样的：美国人是上帝特殊的“选民”，被上帝差遣到美洲来为人类树立一个典范；美国是自由的灯塔和共和的榜样，是自决与自治原则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就国际经历而言，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从未像欧洲帝国那样寻求对其他国家的征服和主宰，美国没有侵略别国的经验；不仅如此，美国一向乐善好施，其对外政策目标不是掠取而是给予。^③这一身份叙事的核心是美国与欧洲不同，即美国例外的观念。^④罗斯福等人拥抱帝国主义，主张通过战争在海外攫取殖民地，实际上是把美国变成欧洲那样的帝国，其背后不是美国例外论，或美国主义（Americanism），而是来自欧洲的权力政治原则。帝国主义政策显然与美国的自我理解和传统的国家身份叙事存在尖锐的冲突：美国的使命是提供一种不同于欧洲的道路，向欧洲和整个世界传播美国的原则而不是接受欧洲的原则。如果美国按照罗斯福等人设计的方向发展，美国在卷入国际政治后将像约翰·昆西·亚当斯警告的那样，“失去自己的精神”，即失去了自我，这不是美国人希望付出的代价。

帝国主义者奉行的对外政策和对帝国身份的追求遭到激烈的抨击。反帝国主义者提出，兼并海外领土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对美国的立国原则和国家特性的背叛。著名反帝国主义者、民主党领袖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谴责这些帝国主义者信奉“君主制”的原则，接受“欧洲观念”（European idea），正在试图“效仿欧洲帝国”。^⑤另一位著名的反帝国主义者、共和党参议员乔治·霍尔（George Hoar）则批评帝国主义者的政策将使美国“从一个建立在《独立宣言》之上，在华盛顿的忠告指导下的共和国转变成一个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卑鄙不堪的、平庸的帝国”。^⑥

① Frank Ninkov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erialism*,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p. 37.

② 元叙事（meta-narrative），有时也称主叙事（master narrative），是文化批评理论的重要概念，意指用来全面解释人类与国家历史经历的核心思想或认知图式（schema），是其他叙事的起源、基础和出发点。元叙事往往具有优先和主导地位，是一种权威话语，具体叙事往往需要与元叙事相一致才会获得认可和接受。

③ 学者杰里尔·罗赛蒂提出有三个关键性的特征可以说明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外部世界，即大多数美国人天生就认为：美国人清白无罪；美国人乐善好施；美国例外。（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73页）

④ 博拉·马德森认为，“美国例外的思想弥漫在美国每一个历史时期，在几个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有关美国和美国人身体的激烈争论中，美国例外的思想是最强有力的一种理论……不断被用来描述从清教起源一直到现在的美国文化身份的演进”。Deborah L. Madse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Jackson, Mass.: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pp. 1-2.

⑤ William J. Bryan, “Imperialism,” Speech Delivered at Indianapolis in Response to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to Notify Him of His Nomination to the Presidency, Aug. 8, 1900, in Philip S. Foner and Richard C. Winchester, eds., *The Anti-Imperialist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nti-Imper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From the Mexican War to the Election of 1900*,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84, p. 433.

⑥ “Mr. Hoar Sees Danger Ahead,” *New York Times*, Nov. 2, 1898, p. 3. <http://query.nytimes.com/mem/zrchive-free>. (2008年12月7日)

显然，在反帝国主义者眼中，帝国主义是非美的，是对美国原则的背叛，就像反帝国主义者同盟纲领所说的那样，“1861年的企图是分裂这个国家，而1899年的企图是消灭这个国家的根本原则和最高贵的理想”。^①反帝国主义同盟吸引了来自两党的众多政治与知识精英。

显然，反帝国主义者的主张更符合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国家身份的理解。他们虽然没能阻止美国占领菲律宾，^②但却成功地使占领海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在道义上受到质疑。1900年后，很少有政治家或报纸继续公开鼓吹美国在海外建立新的殖民地。实际上，占领菲律宾是美国扩张的顶点而不是起点。连最有影响的帝国主义者、接替麦金莱担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也断然拒绝兼并海地和多米尼加的建议，断定继续在海外谋占领土是不得人心的。正如知名学者路易斯·哈茨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运动受到了美国独一无二的民族主义，即一种国家自由主义的牵制而失去了影响力”。^③

帝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争执的核心是美国在国际社会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拥有什么样的地位，是继续做共和典范还是加入欧洲的帝国俱乐部。正如反帝国主义同盟1900年散发的《自由短册》(Liberty Tract)所疑问的那样：“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是要做民族国家，还是要成为一个帝国？”做前者就是“继续忠诚于美国的理想”，“用一个公正和繁荣的共和国作为强大和仁慈的榜样来美化世界”，而做后者则是“放弃我们平等与自由的原则，为了商业利益而从事征服，对外国人进行殖民统治，对附属民族实行军事控制”。^④这确实是崛起的美国面临的一大困惑。支持帝国主义政策的人把欧洲化看做是美国加入国际政治、追求大国地位应该付出的代价，从共和典范转变为殖民帝国是美国在新形势下重塑自我的需要。反帝国主义者则无法认同帝国主义者塑造的美国新角色，坚信美国应该继续充当自由榜样，“通过它无声的榜样的力量来动摇君主的宝座和瓦解贵族统治，并给黑暗中的人们以光明和鼓舞”。^⑤他们担心美国对海外帝国的追求将不可避免地瓦解美国的国家特性，摧毁美国的立国基础，并使美国最终失去自我。

帝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的争论表明美国人在美国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问题上的长期共

① “Platform of the 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 1899,” Avery Craven, Walter Johnson and F. Roger Dunn, ed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p. 643.

② 1899年2月6日参议院就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含有把菲律宾割让给美国的巴黎条约投票时，赞成票仅比批准条约所需的票数多两票，而且至少有10张来自民主党的赞成票是在民主党领袖、著名的反帝国主义者威廉·布赖恩的建议下投出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布赖恩和一些民主党参议员突然改变立场，巴黎条约可能无法获得参议院批准。而布赖恩建议民主党投票批准条约的原因是他认为批准和约可以尽快结束美国在菲律宾的战争，以免造成更多的杀戮，然后他领导的民主党可以再推动参议院通过一项承诺给予菲律宾独立的决议。2月14日，美国参议院就该决议案(Beacon Resolution)进行投票，赞成票与反对票票数相等，按照宪法规定，此时由担任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共和党人卡雷特·霍伯特(Garret A. Hobart)投票决定，霍伯特投了关键的一张反对票，使该决议案最终流产。这两个事件说明反对兼并非律宾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参见Fred H. Harrington, “The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8-1900,”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 22, no. 2 (September 1935), pp. 221-222.

③ 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San Diego, CA.: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p. 292.

④ “Liberty Tract No. 8,” in Philip S. Foner and Richard C. Winchester, eds., *The Anti-Imperialist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nti-Imper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p. 306.

⑤ William J. Bryan, “Imperialism,” in Philip S. Foner and Richard C. Winchester, eds., *The Anti-Imperialist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nti-Imper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pp. 442-443.

识已经瓦解：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和国际环境都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美国是继续扮演传统的作为自由“避难所”和“共和榜样”的角色，还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追求大国地位，成为一个像欧洲列强那样的帝国？前者已经不合时宜，后者虽然符合“时尚”，但似乎又不是美国人愿意充当的角色。

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社会也为工业化时代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所困扰。被杰斐逊视为美国民主柱石和共和美德化身的自由农场主阶层在工业化浪潮中不仅迅速衰落，而且成为社会的造反者；大城市的贫富分化不仅带来严重的阶级冲突，而且直接冲击美国诞生于平等之中的国家神话；而大批来自东、南欧的新移民的涌入把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带入美国，开始威胁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导的美国文化特性；针对移民的强制美国化运动和排外主义的兴起引发了国内尖锐的族群矛盾，提出了谁是美国人、谁有资格成为美国人的问题。

大体说来，一种严重的国家身份危机困扰着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当时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注意到弥漫在美国社会的自我怀疑和迷惘，他在1906年的一篇文章中称美国人“对自己的恐惧现在取代了古老的对敌人的恐惧”。^①这种恐惧实际上来自于美国人的困惑：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我在世界上的位置在哪里？美国需要对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国家特性以及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即重塑美国的国家身份，为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的美国确定长远的国家政策走向。一战的爆发为这种重塑提供了契机，并将这一任务放到了威尔逊的肩上。

三、威尔逊、一战与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以及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威尔逊在世纪之交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大变局对美国的意义。他在1900年10月撰文提出，“世界的新秩序正在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新时代正向我们走来，就像一个毫无征兆、突然而至的幽灵一样”。^②在威尔逊看来，不仅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组在125年前摆脱英国统治的小邦，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国”。特别是美西战争“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给美国带来“迅速的变化”，使美国“大踏步走进开放的世界舞台”。^③而正因为美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不能继续与世界事务“保持距离”，“继续奉行不偏不倚的中立原则”。^④美国应该“富有远见”，“看到世界的广大”，看到美国的“繁荣和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调整自己以适应新形势”，“让新世纪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⑤在威尔逊看来，面对历史大变局，美国需要重新界定自己。

那么，如果美国放弃孤立，美国应该以什么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美国要扮演什么角色？美

① William James, "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 (1906) <http://www.constitution.org/wj/meow.htm>. (2008年11月27日)

② "Democracy and Efficiency," in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69 volum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1991, vol. 12, p. 12.

③ "The Ideals of America," in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12, p. 216.

④ "Democracy and Efficiency," in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12, pp. 11-12.

⑤ Lecture at New-Century Club,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12, p. 44.

国要在新世纪讲述一个什么样“不同的故事”？对此，威尔逊在当选总统以前似乎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思考，也没有清晰的想法。毕竟，此时的威尔逊还只是一位学院中的学者，思考这些问题并非其角色要求。

威尔逊于1913年成为总统后，塑造美国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的任务不可避免地落在他的身上。在八年的总统生涯中，威尔逊在无数的公开演讲中大谈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实际上，他是通过这种方式为新时代的美国重塑自我形象，重构国家身份。他自己也深刻地意识到重新规划美国的国际角色和国家身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在一次公开演讲时说：“关于美国的国内生活，我们已经有一个计划，我们不会忘了这一计划。但是，在我们将在这个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问题上，我们从未为我们美国制定一个计划，美国应该立即制定一个计划。”^①

威尔逊的身份塑造工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13年3月，大体止于1915年底。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威尔逊一方面继续强调美国力量的增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要求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指出这种作用不是像欧洲国家那样追求国家私利，而是成为一个服务于人类的正义力量。威尔逊试图改变美西战争以来帝国主义者对欧洲权力政治的膜拜和对海外帝国的追求，通过诉诸于美国例外的观念，极力强调美国国际角色的独特性，把美国塑造为一个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独一无二的理想主义国家，虽然不想卷入战争，但准备在战后建立和平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第二阶段大体上开始于1915年底，止于1918年11月战争结束。由于1915年5月德国潜艇击沉客轮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美德关系逐渐恶化，美国并于1917年4月对德宣战，威尔逊开始把德国描绘成一个践踏人类权利、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力量，而把美国塑造成一个挺身而出捍卫人类权利的“自由卫士”。美国新的国际角色和身份开始清晰和明朗化：美国不仅是自由的“灯塔”和共和的“典范”，还要在全球范围内担当自由的“捍卫者”。

第三阶段始于战争结束直至威尔逊辞世。威尔逊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如何激励和说服美国人在德国战败、自由威胁解除后继续卷入国际政治，并承担起来缔造和平和建立战后新秩序的任务。威尔逊试图把美国的角色从自由的“卫士”进一步发展为“世界领袖”。

威尔逊深知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拥有影响世界的巨大力量。就任美国总统后，威尔逊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是美国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他认为这是已经崛起的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他在1914年6月15日对美国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们说：

对头脑冷静的人来说，美国需要讨论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是这样的：我们将如何运用这个伟大国家的力量和影响？我们是不是将像以前各国扮演的角色那样，用我们的力量仅仅去追求自己的扩张和物质上的好处呢？^②

1916年4月13日，威尔逊在杰斐逊日宴会的讲话中继续把这个问题提交到美国人民面前。他说，美国国家银行的财富比英、法、俄、德、荷、日和瑞士等国银行财富的总和还要多，但

① Woodrow Wilson, "America and the Rights of Humanity," Speech Delivered at Omaha, Oct. 5, 1916, in Ray Stannard Baker and William E. Dodd, eds.,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2 vols., New York: Harper, 1926, vol. 2, p. 346.

② Wilson, "Be Worthy of the Men of 1776," Address at Independence Hall, Philadelphia, July 4, 1914,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142.

是,“我们不得不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使用这一力量?’”^①

那么,美国应该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呢?在威尔逊看来,美国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把自己的力量用于压迫人类和自己的扩张”,“如果美国也走前人常走的历史道路,那么带给她自己的将是耻辱而不是光荣”,美国“必须开辟出新的道路”。^②那么,这一“新道路”是什么呢?那就是用美国的原则和理想为人类服务,做一个“生活在自己理想中”的国家。^③威尔逊说:“为什么以前在世界上从未有国家在决定其对外关系时毫无私心呢?我的抱负是能看到美国树立一个伟大的榜样,不仅在道德上是一个伟大的榜样,同时在思想上也是一个伟大的榜样。”^④他称“这才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⑤

威尔逊首先从历史中寻找美国的独特性。在威尔逊看来,美国从建立伊始就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是为了伟大的道义目标。他在1913年说:“美国之所以是美国不是因为它富裕,也不是因为它为庞大的人口提供了物质繁荣的伟大机会。美国是一个在世界所有人听起来等同于个人权利和个人机会的名字。”^⑥在后来的演讲中威尔逊又多次重申这一主题:“美国的诞生不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在这个世界上有过一个最令人瞩目的积累和使用物质财富的榜样,而是为了向世界每一个地方的人们展示通向正义和自由的道路。”^⑦

威尔逊极力为美国塑造一个理想主义的自我形象,以便与其他国家以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大国相区别。既然美国是为人类服务的,那么美国就不能满足于自己独善其身,还应该帮助其他国家实现自由。他号召美国人“不仅应支持美国境内的自由,同时也要支持美国之外的自由”:

美国的全部意义不仅仅是她应该打开大门,对别的地方受压迫、愁苦的和不幸的人说:“我们的大门是开放的,欢迎你们到这里来寻找自由的机会。”我们还应该在这里对那些仍然留在自己家园的人说,“在帮助你们的问题上,如果你们愿意对我们的帮助加以光荣的和自由的利用,我们愿意毫无保留地帮助你们”。^⑧

① Wilson, “These are Days That Search Men’s Heart,” Address at Jefferson Day Banquet, Willard Hotel, Washington, April 13, 1916,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2, p. 141.

② Wilson, “The Idea of America is to Serve Humanity,” Address to the Graduating Clas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cademy, Annapolis, June 5, 1914,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130.

③ Wilson, “Meaning of the Civil War,” Address Delivered at Arlington, May 31, 1915,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338.

④ Wilson, “The Day of Isolation is Gone,” Speech at Shadow Lawn at a Meeting of New Jersey Citizens, November 4, 1916,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2, p. 392.

⑤ Wilson, “The Idea of America is to Serve Humanity,” Address to the Graduating Clas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cademy, Annapolis, June 5, 1914,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130.

⑥ Wilson, “A New Latin-American Policy,”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Southern Commercial Congress Held at Mobile, Alabama, October 27, 1913,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68.

⑦ Wilson, “The League of Nations,” Speech at Indianapolis, October 12, 1916,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2, p. 358.

⑧ A Nonpartisan Address in Cincinnati, October 26, 1916, in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威尔逊强调美国的独特性是为了让美国人接受他为美国规划的新角色。他告诉美国人，孤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管我们如何选择，我们都肯定要在世界上扮演更大的角色”，^①杰斐逊提出的让美国充当自由的“榜样”，“先是在美国，然后通过美国的示范（让自由）扩展到世界各地”的主张已经不合时宜了，美国必须“运用自己的力量”积极促进自由的事业。威尔逊在1916年杰斐逊日宴会上说：

你无法从托马斯·杰斐逊的事迹中获得榜样，杰斐逊领导的是一个刚刚为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而战斗的小国，没有物质实力，没有外国的尊重，没有获得财富的机会，也缺乏经受长期磨难的经历。托马斯·杰斐逊时代的环境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环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②

在威尔逊心中，美国之所以要积极地支持其他国家的自由，不仅因为美国已经强大了，还因为“建国之父”开启的民主试验在美国已经“成功”。同奥尔尼一样，威尔逊认为“民主不再是一个试验”，而已经成为“切实可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模式：

就在不久以前的美国革命时代，民主在世界上被认为是一种试验，我们被认为是轻率的试验者。……但是证明试验成功的那一天已经到来了。我们现在知道，世界也知道，我们那时似乎草率承担的事情已经切实可行，我们已经在世界上建立了一个由普遍良知和维护、促进信仰构成的政府。^③

威尔逊主张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和支持国外的自由，并不等于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欧战爆发后，威尔逊要求美国人“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保持不偏不倚”，并称“每一个真爱美国的人的言行都应该符合真正的中立精神，这是一种对所有交战方都不偏不倚、公正和友好的精神”。^④

与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的用语相类似，威尔逊也用美国与欧洲相距遥远以及战争与美国无关来论证美国的中立，反对美国卷入欧洲的冲突。但是威尔逊的中立并不等同于19世纪的孤立，因为他并不打算让美国像以前那样对欧洲战争完全不闻不问，而是要让美国在未来议和中充当调停者与和平的促进者。他宣称美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是“做一个伟大的和平国家，一个准备扮演以朋友而不是偏袒者的身份进行不偏不倚的调停以及提供和平与和解忠告角色的民族”。^⑤虽然“战争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其起因也无法触动我们”，但是“战争

Woodrow Wilson, vol.38, pp. 540-541.

- ① Wilson, "Fighting is the Slow Way to Peace," Address before the Salesmanship Congress, Detroit, Michigan, July 10, 1916,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2, p. 229.
- ② Wilson, "These are Days That Search Men's Heart," Address at Jefferson Day Banquet, Willard Hotel, Washington, April 13, 1916,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2, pp. 141, 143.
- ③ Wilson, "Democracy No Longer an Experiment," Address to the 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 Washington, September 28, 1915,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p. 371-372.
- ④ Wilson, "American Neutrality—An Appeal by the President," Presented in the Senate, August 19, 1914,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p. 157, 158.
- ⑤ Wilson, "American Neutrality—An Appeal by the President," Presented in the Senate, August 19, 1914,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158.

的存在赋予我们表示友谊和给予无私服务的机会”。^①而表达友谊的方式“不是现在就支持一方或另一方”，而是“做好在战争结束后帮助双方的准备”，特别是“在重建和平过程中提供支持”。^②

在威尔逊的设计中，美国的独特角色和对人类的最好服务就是不参与对物质利益的角逐，而在战后成为一个缔造和平的力量。这是威尔逊在战争初期为美国确定的角色。

威尔逊对美国角色的界定与他此时对战争起因的理解有关。他没有把战争的爆发仅仅归咎于德国，基本上认为战争是“长期被约束和压制的巨大的盲目物质力量释放”的结果，^③“不仅德国要为这场战争负责，其他国家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④因此此次战争与以前曾发生的历次欧洲战争并没有什么不同，交战双方都是为了自私的国家利益。美国作为伟大的道义力量当然不能卷入这种争夺自私国家利益的战争，而应在战争结束后扮演缔造和平的角色。应该看到，这一角色实际上与19世纪美国对待欧洲冲突的态度已经有很大不同：在19世纪，美国对欧洲战争与媾和完全是不闻不问的。

随着由德国潜艇战导致的美德关系的恶化，威尔逊逐渐改变了对战争起因和德国政府的看法，开始重新思考美国的角色。在威尔逊看来，德国不顾美国多次警告和抗议发动潜艇战，造成大量美国人员的伤亡，是对中立权利和生命尊严的粗暴践踏。大体上从1915年底开始，威尔逊逐渐把德国政府描绘成对战争起因负责，威胁人类自由和权利的邪恶的专制政府，是美国的敌人。与德国作为敌人形象同时出现的是美国作为人类权利保卫者的形象，美国的自我形象开始被重塑：既然已经出现了严重威胁人类自由和权利的敌人，那美国就不能等到战后充当和平的调停者，而现在就应该挺身而出，消除对自由的威胁，做人类自由和权利的“保卫者”，为此还要做好军事准备，甚至直接参战。

1915年11月4日，威尔逊在谈及美国是否应该进行军事准备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声称美国要“做世界所有国家的朋友”，而是表示美国“不仅自己享有自由和繁荣，而且还要成为世界各地享有自由和渴望自由的人们的朋友和有创见的支持者”。^⑤他在1915年12月7日的国情咨文中称：“我们不会把对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发展的热衷仅仅局限在与我们相关的事件和事态上，无论哪里，只要有哪个民族想要走争取独立与权利的道路，我们都会有相同的热忱。”^⑥

1916年1月31日，威尔逊更进一步宣称美国要“在一个法律原则已经被破坏的世界上维护国际法的原则——不是技术性原则而是涉及正义和人类的国与国之间的根本原则”。^⑦

① Wilson, "Second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December 8, 1914,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226.

② Wilson, "Call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Address Delivered at New York, April 20, 1915,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303.

③ Wilson, "The Great War," Address before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Protestant Church, April 8, 1915,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297.

④ Wilson, "A Memorandum by Herbert Bruce Brougham," December 14, 1914, in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vol. 31, p. 459.

⑤ Wilson, Address before the Manhattan Club, New York, November 4, 1915,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385.

⑥ Wilson, "Third Annual Address to Congress," December 7, 1915,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410.

⑦ Wilson, Address at Auditorium, January 31, 1916,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2, p. 61.

那么谁是国际法原则的破坏者？在威尔逊眼中，当然是德国，威尔逊开始强调德国政权的独裁性质和对自由的威胁。他在1916年4月19日的国会演讲中首次公开谴责德国政府“在追求自己短期目标时不顾及所有国家的中立权利”，“有目的地使用潜艇对商船进行残忍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是“对正义和人类基本原则的最明显的践踏”。^①在1917年4月2日请求国会以德宣战的演讲中更是称“德国目前针对商业活动的潜艇战是对人类宣战”。^②

那么德国为什么会残忍、粗暴地践踏人类权利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威尔逊的解释是：德国政府是一个邪恶的、专制的政府。他称德国政府“派间谍遍布其邻国”，“阴谋制造狡诈的欺骗和侵略计划”，^③“特别具有攻击性和侵略性”，^④是“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统治的“军事独裁政府”，^⑤是“德意志邪恶的统治者”，其目标是征服世界。^⑥“这个独裁政府”不仅“阻止自己人民实现自治”，而且“要把它的意志强加给它的邻国和我们（美国）”，这“迫使世界上每一个文明国家要么放弃他们的愿望，要么宣战来保卫自己”。^⑦德国政府不仅是美国的敌人，也是“自由的天然敌人”。^⑧

威尔逊声称，“专制政府的存在”就是“对和平与自由的威胁”，^⑨而“伟大的民主国家是不好战的，它们既不寻求也不希望战争”。^⑩在一个存在像德国这样有组织的专制力量的世界上，“民主政府的安全不可能得到确保”，因此“我们将接受与这个自由的天然敌人发生战争的挑战，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去挫败和摧毁德国的野心和实力”。他提出后来被广为引用的美国外交口号：“必须为民主创建一个安全的世界（The world must be safe for democracy），世界和平必须建立在可检验的政治自由之上。”^⑪

威尔逊实际上提出了对战争性质的新理解：欧洲国家为“盲目的物质力量”所推动的、各

-
- ① Wilson, "The 'Sussex' Affair," Address to Congress, April 19, 1916,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2, pp. 155, 157, 158.
- ② Wilson, "For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Germany,"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pril 2, 1917, in Ray Stannard Baker and William E. Dodd, eds.,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2 vols,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2, Reprinted from the 1927 edition, vol. 1, p. 8.
- ③ Wilson, "For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Germany,"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pril 2, 1917,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 12.
- ④ Wilson, "This Is a People's War," Flag Day Address Delivered at Washington, June 14, 1917,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 61.
- ⑤ Wilson, "Four-minute Men," Four-minute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July 4, 1918,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 236.
- ⑥ Wilson, Address Delivered at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December 4, 1917,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 128.
- ⑦ Wilson, "Four-minute Men," Four-minute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July 4, 1918,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p. 236-237.
- ⑧ Wilson, "For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Germany,"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pril 2, 1917,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 14.
- ⑨ Wilson, "For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Germany,"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pril 2, 1917,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 11.
- ⑩ Wilson, "Third Annual Address to Congress," December 7, 1915,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410.
- ⑪ Wilson, "For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Germany,"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pril 2, 1917,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 14.

自为自己利益而战的权力之战变成涉及人类基本权利的道义之战。而“当涉及世界和平和世界人民的自由的时候，中立不再是可行的和可取的，对和平与自由的威胁在于存在受有组织的势力支持的专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中立走到了尽头”。^①

于是战争的性质变成“民主与专制之战”，美国加入战争是为“世界和平和世界人民的自由而战”。美国的目标不仅是实现“没有胜利者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同时也是没有独裁者的和平。尽管领导一个“伟大的热爱和平的人民……投入一场最恐怖、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威尔逊说，“正义比和平更珍贵”，美国乃是为正义而战：“为民主，为那些服从政府以便在自己的政府中有发言权的人民的权利，为弱小国家的权利和自由，为通过自由人民的一致行动将给所有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全并让世界最终获得自由从而实现正义的普世胜利而战。”^②

在1917年5月30日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演讲中，威尔逊进一步阐释说：

我们在一开始就说过，我们建立这个伟大的政府，以便渴望自由的人们可以有一个避难所和一个他们可以实现希望的地方。而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政府，已经保存了这样的政府，已经维护了这样一个政府的权力。我们现在要对全人类说，“我们建立这一政府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单独来享有自由，因为我们现在准备帮助你们，在世界的战场上为人类自由的事业而战。”……在上帝的佑护下，美国将再一次有机会向世界证明，她生来就是为人类服务的。^③

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完成了树立典范的任务，现在要在全世界积极促进和捍卫自由。美国的国际角色在威尔逊的演讲中悄然发生了变化，作为“自由捍卫者”的美国自我形象已经浮现。

威尔逊还把德国比喻为当年阴谋摧毁北美自由的英国，把这场战争比喻成当年捍卫自由的独立战争。他说，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将切断“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把美国人“限制在西半球”，其目的是“损害和破坏我们国家生活的每一个过程，把美国的命运置于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因此我们实际上是在为美国的自由与自治而战，好比我们重新打一场当年革命时代的战争”。^④他在1917年11月7日感恩节致辞中说：

通过拿起武器反抗威胁要主宰和奴役各地人们的专制政府，通过与其他自由国家的人民一起为世界所有国家争取我们曾为自己争取并已经获得的东西，我们已经被赋予了为人类服务的机会，就像我们在独立宣言的伟大日子里曾为自己服务一样。^⑤

这种类比的意义在于告诉美国人，“自由捍卫者”的角色与美国传统角色并不矛盾，新的美

① Wilson, "For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Germany,"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pril 2, 1917,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 11.

② Wilson, "For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Germany,"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pril 2, 1917,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 16.

③ Wilson, "America Was Born to Serve Mankind," Memorial Day Address at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May 30, 1917,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vol. 1, p. 53.

④ Wilson, "Appeal to the Farmers to 'Stand By'," A Message to a Farmers' Conference at Urbana, Illinois, January 31, 1918,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vol. 1, pp. 169-170.

⑤ Wilson, "Thanksgiving Day," Proclamation Issued, November 7, 1917,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 111.

国身份不过是传统美国身份的延续和发展，意在说服美国人接受“保卫”其他国家自由的责任。他号召美国人民团结起来让1918年的美国独立日成为美国为“世界所有民族都有独立宣言而奉献的开端”。^①

威尔逊还经常诉诸神意，并用基督教的语言来描绘美国的新角色。他称美国“是一个上帝经由我们之手建立的国家”，^②“这个伟大的国家正在迎来新角色和新责任”，但是“这不是美国精心规划的结果，而是率领我们走上这条道路的上帝之手带来的，我们不能拒绝，而只能以高远的眼光和饱满的精神前进，去跟随上帝的指引”。^③威尔逊称“上帝正在以他自己的方式创造一种可以让我们用来最好地为人类服务的方法”，即让美国成为“上帝手中确保人类能安享自由的工具”。^④也就是说，美国从自由的“榜样”变成自由的“卫士”实际上是上帝的安排，美国身份与角色的转变是上帝的意志。

不难发现，威尔逊所塑造的美国自我形象和国际角色直接否定了乔治·华盛顿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等人对美国角色的界定——“所有人自由和独立的真诚祝愿者”，但“仅仅是自己自由和独立的捍卫者和维护者”，而且“不到国外去寻找恶魔来消灭”。威尔逊实际上是要美国与这一传统角色决裂，不仅“捍卫”自己的自由，而且要到国外去寻找“恶魔”——自由的敌人——加以消灭，充当整个人类权利的“捍卫者”，因为国外出现了危害自由的魔鬼和恶徒。威尔逊解释说，做全人类自由的捍卫者并不是要违背华盛顿定下的准则，无视乔治·华盛顿的警告，“陷入其他国家的联盟之中”（*entangling alliance*），而是加入另外一种联盟，这种联盟“将使世界各国人民摆脱旨在追求单独和自私利益的联合，并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在共同权利和正义基础上维护世界和平”。这种联盟不是为了自私的国家利益而建立的，而是为了维护普遍的正义与和平建立的。与传统的结盟截然不同，在这样的联盟里“有自由，而不是利益纠纷”。^⑤威尔逊后来进一步解释说，华盛顿所说的避免与外国结盟实际上是指“避免卷入其他国家的野心和图谋之中”，而并非是让美国对国外发生的一切都不闻不问，因为“涉及人类基本权利之事并非外国之事”而是整个人类之事，美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不能“不闻不问”，美国积蓄力量就是要“为人类的权利而战”。^⑥通过对华盛顿“伟大准则”的重新解释来论证美国卷入国际政治的必要性，从建国之父们反对介入外国事务的警告中推导出美国进行全球干预的理由，威尔逊这种“修辞重组”（*rhetorical restructuring*）是相当成功的。^⑦在华盛顿眼中，外部世界是腐败和凶险

① Wilson, "Four-minute Men," Four-minute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July 4, 1918,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 237.

② Wilson, "Hard Tasks Ahead of the Nation," Address delivered at Gettysburg, July 4, 1913,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44.

③ Wilson, "Presenting the Treaty for Ratification," Address to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10, 1919,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p. 551-552.

④ Wilson, Address to Confederate Veterans at Washington, June 5, 1917,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 55.

⑤ Wilson, "American Must Become Partners in the Guarantee of a Just Peace," Memorial Day Address Delivered at Arlington, May 30, 1916,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2, p. 195.

⑥ Wilson, "America and the Rights of Humanity," Speech Delivered at Omaha, October 5, 1916,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2, p. 347.

⑦ 关于“修辞重组”的提法，参见 Jason C. Flanagan, "Woodrow Wilson's 'Rhetorical Restruct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Self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rman Enemy," pp. 115-148.

的,美国的安全取决于美国远离这种凶险;而在威尔逊眼里,外部世界仍然是腐败和凶险的,但美国应该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和净化而不是回避来获得安全。

正如大量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国家身份的建构通常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完成的,“他者”的出现会大大有助于共同体意识和国家身份的形成,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敌人的出现自然就充当了“他者”的角色,帮助界定国家身份的特征与界限。在威尔逊的一系列公开言论中,德国政府被塑造成邪恶的专制力量和自由的天然敌人,企图通过发动战争征服世界。与此同时,美国被界定为自由的全球卫士,受上帝差遣来为人类保卫自由。也就是说,美国作为人类权利“捍卫者”的正义形象与德国作为人类权利“践踏者”的邪恶形象是相伴而生的,德国扮演了美国自我认知演进过程中的“他者”角色。正是在与德国的冲突中德国作为“他者”的出现使威尔逊顺利地实现了对美国新形象和新角色的塑造,也使美国成功地完成了国家自我形象的转变——从自由的“榜样”成为自由的“捍卫者”,并使这一形象变得丰富、生动和具体化了。可以说,没有德国作为“他者”的出现,美国“自我”形象的这一转变是很难完成的。学者艾多·奥伦对此评论说:“只是在出现美国与德国的政治敌对之后,威尔逊才开始把民主的美国与专制的德国区别开来。实际上,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自我描绘和界定民主的那些规范部分是被与帝制德国的冲突塑造的。”^①

战争结束后,对自由的威胁至少暂时不存在了,如何说服美国公众继续支持美国在战时扮演的自由“卫士”角色,承担起建立战后新秩序和维护和平的任务,是威尔逊面临的重大任务。同时,威尔逊还试图把美国的角色从自由的“捍卫者”发展成“领导者”,也就是说,美国不是普通的捍卫者,而是要在维护和平、促进自由方面担当“领袖”角色。而担当这一角色的标志就是批准凡尔赛和约,加入国联,国联是美国领导世界的有效工具。这一时期威尔逊的身份建构活动主要体现在劝说国民支持美国加入国联的一系列演讲中。

美国在19世纪不愿意卷入欧洲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政治险恶,盛行的是权力政治原则,美国卷入欧洲政治会沾染欧洲的腐败和堕落,失去自己的国家特性,甚至导致共和国的覆亡。为争取民众的支持,威尔逊首先告诉美国人,凡尔赛和约和国联体现的是美国原则,而不是欧洲原则。他在1919年9月的演讲中称:“我发现我们所称的美国原则已经不仅深入到欧洲各国的伟大人民的心中,同时也深入到领导这些伟大民族的那些大人物的思想中”,“这些原则以前从未被写入重要的国际协议中,而现在被写入条约之中”,^②“这实际上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③正因为美国原则主导了战后秩序,威尔逊称今后“不会再有兼并,不会再有土地的掠夺,不会再有政权扩张。这绝对是对历史的根本改变,绝对是一场处理国际关系方式的革命,所有这些都写进了国联盟约里”。^④

因此,美国加入国联,参与国际政治实际上是捍卫美国的原则,美国不仅不会失去自我,甚至还可以通过对世界的改造使美国的自我得到放大,让美国的形象成为整个世界的形象。对

① Ido Ore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Changing U. S. Perceptions of Imperial Germa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2 (Autumn 1995), p. 148.

② Wilson, An Address at Convention Hall, Kansas City, Mo., September 6, 1919,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2, pp. 1-2.

③ Wilson, An Address at Auditorium, Omaha, Nebraska, September 8, 1919,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2, p. 31.

④ Wilson, An Address at Coliseum, Sioux Falls, South Dakota, September 8, 1919,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2, p. 50.

此，学者戴维·弗罗姆金评论说：

威尔逊的理论是，如果她跨洋过海仅仅是为了净化她在海洋的另一面发现的东西，美国就能够在卷入国际政治的同时仍能保持真实的自我。在威尔逊的领导下，美国走向战争是为了结束战争，美国卷入政治是为了取消政治。美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仅仅是为了改变世界：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它。^①

而如果美国拒绝这一角色，倒可能失去自我，因为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不得不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得不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保持高税收，“时刻做好与世界战斗的准备”，甚至出现一个“军政府”，最终美国会丧失自己的自由。^②

威尔逊还论证说，让美国担任“捍卫全世界自由和有序和平的领袖”其实是共和国缔造者们的期盼，“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他们怀有和宣布的伟大目标，我们就不配称自己是他们的继承人”，“美国承受不起沦为其他国家通常占据的那种地位，仅仅成为众多争夺和追求自私利益的国家中的一员”。^③

威尔逊告诉美国人，美国是唯一有资格担当领袖角色的国家，“因为它从世界每一个文明民族中吸收血液，并且因同情和理解而能够明白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权利、渴望和命运。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此禀赋的国家……是唯一能在组织和平方面对世界进行富有同情的领导的国家”。^④而且，整个世界也盼望美国的领导，作为“世界上唯一能让世界接受其领导和指引的国家”，美国如果“不给予这种领导”，“就将是世界上最不负责的民族”。^⑤“世界将会经历一次情感的倒退，并做出极度心灰意冷的反应，从而导致普遍的犬儒主义”，因为“人类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指望”。^⑥也就是说，美国不仅具有领导世界的能力和资格，同时也具有世界领袖的威望，所缺乏的不过是决心。

为了坚定美国人担任领袖角色的决心，威尔逊诉诸上帝的意志。他在1919年9月9日的演讲中说：“我们要么做鸵鸟，要么做雄鹰。”做鸵鸟就是“把自己的头埋起来”；而做雄鹰则是“飞向高空，在那里用清晰的眼睛来看人类的事务，看到美国的事务如何与世界各地人类的事务联结在一起，看到整个世界已经伸出手来，转向我们这个上帝保佑的国家”。“上帝正在帮助我们”，世界人民在“追随我们”，“我们应该去领导”。^⑦威尔逊告诉美国人，“美国实现自己使命的那一天已经到来了”，“她将领导世界摆脱一个世纪的纷争和苦难，让世界不会再陷入这长达

① David Fromkin, *In the Time of the Americans: FDR, Truman, Eisenhower, Marshall, MacArthur—The Generation That Changed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5, p. 539.

② Wilson, An Address at Coliseum, Sioux Falls, South Dakota, September 8, 1919,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2, p. 50.

③ Wilson, "League of Nations as a Campaign Issue," Telegram to G. E. Hamaker, Chairman of the Multnomah County, Oregon, Democratic Central Committee, May 9, 1920,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2, p. 484.

④ Wilson, An Address at Auditorium, St. Paul, Minn., September 9, 1919,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2, p. 79.

⑤ Wilson, An Address at Minneapolis, Minn., September 9, 1919,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2, pp. 70-71.

⑥ Wilson, An Address at Coliseum, Sioux Falls, South Dakota, September 8, 1919,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2, p. 52.

⑦ Wilson, An Address at Minneapolis, Minn., September 9, 1919,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2, pp. 75-76.

一个世纪的苦难之中”。^①

直到去世前三个月，威尔逊在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仍然劝说美国人“抛弃自私的利益，重新制定具有最高远理想和目标的国际政策，并以此来行动”，并称“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到美国真正的传统”。^②

威尔逊对美国独特的国际角色的塑造是以他对美国国家特性，即不同族群美国人的同一性的阐释为基础的。一战爆发，特别是美国卷入战争后，美国国内不同族群之间矛盾加剧，威尔逊面临一个迫切的任务：如何培育不同族群之间的一体感，以消弭族群矛盾，促进国家的团结和进行战争动员。威尔逊采取的策略是强调不同族群的美国人所具有的同一性，并把这种同一性诠释为以自由为核心的共享价值观和共同使命感，特别是对自由和自治政府的信守与热爱构成所有族群的共同特征，也就是说，作为美国人的条件和意义不是其族群和宗教特性，而是其对自由的信仰，正是这一点成为美国的国家特性和所谓的“美国精神”。

威尔逊1914年5月在纪念维拉克鲁兹战役^③阵亡将士的演讲中声称，尽管美国人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区，但他们具有一种共同性，即对美国精神的“信奉”，正是这一点使不同血缘和不同种族的人都成了“美国人”。他说：

这些英雄们血管里流的是真正的我们的血，我的意思是说，美国的血。美国的血不是来自某一个国家，不是来自某一个种族，不是来自现代世界的某一种语言，是世界各地自由的人们把他们的兄弟和儿女派到这个国家来建立一个伟大的合众国。……当他们奔赴维拉克鲁兹的时候，他们不再是爱尔兰人，或德国人，或法国人，或希伯莱人或意大利人，他们是美国人，无论他们来自哪一个种族，他们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是美国人，在美国性（Americanism）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属于一种独特意义上的美国血统，他们通过显示对我们精神的信奉证明了这一点——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想的、希望的和做的都是美国的事情。^④

所谓的“美国精神”和“美国性”也就是自由的精神。威尔逊在1919年9月9日的演讲中继续阐发这一思想：

虽然我们在起源和历史记忆方面是如此的不同，但我们都是美国人。如何按照历史的长短来衡量，美国的历史记忆并不久远，我们这个民族的千百万人在他们心中拥有的是其他民族的传统，从未在美国生长过的民族的传统，但是我们都清楚无误地是美国人，甚至在外表上看也是美国人，而不是其他。这一现象只可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这个国家的实践和传统中，有一整套原则，不论它是否完美，已经深入到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的意识中。^⑤

① Wilson, An Address at Bismark, North Dakata, September 10, 1919,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2, p. 100.

② Wilson, "High Significance of Armistice Day," Last Public Address, Delivered over the Radio, November 10, 1923,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2, p. 541.

③ 1847年，美军在墨西哥湾的维拉克鲁兹（Veracruz）登陆，开始向墨西哥城进军，并击败墨西哥军队，结束了美墨战争。

④ Wilson, "The Heroes of Veracruz,"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Brooklyn Navy Yard, May 11, 1914,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p. 104-105.

⑤ Wilson, An Address at Auditorium, St. Paul, Minn., September 9, 1919,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2, p. 77.

除了共享的“美国精神”外，在威尔逊看来，美国人的共同性还在于他们共同的命运和使命，那就是充当上帝手中复兴人类的代理人。他在1919年9月的演讲中称“构成美国人的要素之一”是这里的人民不必像其他国家的人们那样受古老的制度、习俗或政治权威的束缚，而是可以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共同创造未来。他说：“其他国家的人民在前行的时候总是回望过去，而我们则眼望前方，而且关注在历史的长河中正在发生的伟大的事情，那就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把文明提高到新的水平和取得新的成就。正是这些使我们成为美国人。”^①

在威尔逊的建构中，不同族群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和矛盾被忽略了，代之而来的是对自由理想的共同热爱和对上帝使命的共同肩负，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因此都变成了美国人。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不是属于某一特定族群的国度，而是世界所有爱好自由的人们的家园，自由是美国的国家特性。威尔逊在1916年7月的演讲中说：

美国不是任何特殊族群的家园，也不是任何特定的一套政治传统的家园。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其大门就向整个人类开放的家园——向所有爱好自由的人，向所有以平等和机会为理想的人，向所有让人类的根本天性和同情感动其心灵的人。这才是美国。……我很高兴，我将亲眼看到美国真正成为她自己的那一天的到来。^②

在塑造美国人同一性的同时，威尔逊号召移民放弃对来源国的忠诚，抛弃旧大陆的痕迹，“把心灵、思想和一切都带到美国来”，^③成为一个“完全的美国人”。而“完全的美国人”的标准是超越自己的民族来源，表现出对美国这个新国家的忠诚与热爱，也就是对自由理想的热爱。威尔逊1915年5月10日对一群在国外出生、刚刚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移民说：“你们刚刚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向谁效忠？当然不是向临时代表这个伟大国家的那些人效忠。你们刚刚宣誓效忠的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一整套原则、人类的一个伟大希望。”^④

威尔逊对美国人的同一性，即美国的国家特性的阐释不仅有助于国家团结和战争动员，而且具有对外关系方面的意义。既然美国是由来自不同民族的爱好自由的人组成的，既然对自由的热爱构成了美国的国家特性，那么美国当然就要担当人类自由的卫士。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假如美国的特性就在于普世的自由和民主原则，那么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大概就是把这些原则推广到别的国家去”。^⑤ 威尔逊1916年5月30日演讲中的一段话实际上也诠释了国家身份的国内建构与国际建构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美国由世界上所有民族构成这一事实还有另外的意义。……既然我们是由世界所有伟大家庭构成的，而且还是有意识地这样构成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是人类权利的捍卫者。”^⑥ 威尔逊在1916年致推销商大会的信中甚至称，促进自

① Wilson, An Address at Auditorium, St. Paul, Minn., September 9, 1919,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2, p. 78.

② Wilson, "Trying to Help Business," A Luncheon Address, Detroit, Michigan July 10, 1916,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2, pp. 243-244.

③ Wilson, "Men Who Think First of Themselves Not True Americans," May 16, 1914,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 109.

④ Wilson, "Too Proud to Fight," Address to Several Thousand Foreign-born Citizens, Philadelphia, May 10, 1915,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1, pp. 318, 319.

⑤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9页。

⑥ Wilson, "American Must Become Partners in the Guarantee of a Just Peace," Memorial Day Address Delivered at Arlington, May 30, 1916,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2, pp. 193-194.

由是作为“美国人”的标志和每一个“美国人”的责任：

你们的眼光要超出商业的地平线，不要只集中在与你们相关的那些不起眼的交易过程中。要让你们的思想和想象力走出国界之外，遍布整个世界。你们是美国人，这意味着你们生来就要把自由、公正和仁爱的原则带到你们所去的地方。你们要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走出去，出售你们的商品，这些商品将会使世界更加舒适，更加幸福，并让世人皈依美国的原则。^①

实际上，国内社会不同族群的同一性恰恰也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性，美国国家身份的国内建构与国际建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通过一战前后围绕中立、参战和加入国联的一系列演说，通过对美国国家特性的重新阐释，威尔逊为崛起的美国塑造了新的自我形象与国家身份：美国不仅是独善其身的“自由典范”和“共和榜样”，同时还应该是兼济天下的“自由卫士”和维护和平的“世界领袖”。威尔逊对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无疑起到了战争动员的作用，正是威尔逊所高举的理想主义大旗凝聚了精英和民众对美国参战的支持。^②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塑造，美国成功地实现了国际角色与国家身份的转换，解决了美国崛起和踏上世界舞台后一直困扰美国的角色困惑与身份危机。

威尔逊对美国国家身份塑造并非是随意的。他实际上是根据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战争动员的需要，诉诸于美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加上自己适当的创新。

与后来的二战不同，当美国决定卷入一战的时候，美国的国家安全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因此威尔逊实际上无法用安全方面的理由论证美国参战的正当性。同时由于长期的孤立主义传统，让民众接受美国卷入欧洲战争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威尔逊的战争动员任务异常艰巨。威尔逊深知，传统的黎塞留式的“国家理由”无法说服民众支持美国参战，特别是参战决定会遭到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反对并因而导致国内族群冲突的情况下，唯有诉诸美国的理想主义，提出能打动美国人心弦的崇高目标，民众才会接受战争。威尔逊在战争前后的一系列公开演讲中就是用捍卫自由、权利、正义这些崇高的目标来激励美国人。为此他大谈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美国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美国人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拥有什么样的个性和品质，也就是为美国塑造一个崇高的自我形象和国际角色，然后说服美国人按照这一角色去行动。

而在讨论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的时候，威尔逊无疑需要诉诸美国的传统。实际上，美国的历史和传统，特别是例外论和使命观成为威尔逊塑造美国国家身份工程的主要材料来源。威尔逊不止一次提及美国的建国者，声称正是美国的全部历史注定了美国应该扮演自由“捍卫者”的角色，担当这一角色就是“回到美国真正的传统”。好像美国蛰伏一个多世纪之久就是为了今天在全球“捍卫”自由的事业做准备。他把美国历史与自殖民地时代就有的“天定命运”观念相结合，试图在民众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传达一种生来如此和无可选择的情愫，

① Wilson, "Fighting Is the Slow Way to Peace," Address before the Salesmanship Congress, Detroit, Michigan, July 10, 1916, *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2, p. 233.

② 例如，约翰·杜威等相当一批自由主义者并不支持美国卷入战争，但是当通过威尔逊的演讲确认美国的目标是反对欧洲的专制力量和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以取代欧洲均势体系后，杜威等人转而支持战争。威尔逊对美国自我形象和国际角色的塑造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期很多美国政治与知识精英，特别是自由主义者的普遍看法。参见 John C. Farrell, "John Dewey and World War I: Armageddon Tests a Liberal's Faith," in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Charles Warren Center for Studies in American History, 1975, pp. 299-340.

以使民众接受他对美国国家身份的塑造。当然，威尔逊从美国传统中寻找资源是有选择的，并加上了自己的阐释，实际上他是通过重新解释美国传统发明了一套修辞和话语来谈论美国的国家理想与责任，其结果就是为美国塑造了新身份。他声称要回到“美国真正的传统”，实际上真正回到的是他对传统的新理解。

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解释，威尔逊发展了关于美国身份的叙事：美国作为自由的“卫士”，勇敢地进入凶险的国际政治丛林中，去保卫其他国家的自由免遭专制恶魔和独裁怪兽的侵害，就像当年清教徒被上帝差遣来到（北美）荒野（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给北美大陆带来文明并将其从黑暗、蒙昧和欧洲殖民主义蚕食中解放出来一样。

四、威尔逊的国家身份建构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自我理解和身份认知对该国的对外关系和国家走向具有长期而深刻的影响。正如个人身份决定了其利益范围和行为规范一样，国家身份也界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的目标、方向、利益内容和行为方式。国家必须先知道它是谁，然后才能知道其利益在哪里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其利益。一个国家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就会采取与这种身份相符合的行动，而如果国家身份发生了变化，国家利益也会发生变化。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国家自我认知，一个国家也就没有了方向和目标，当然也就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甚至缺乏使用自己力量的动力。实际上，国家身份或者说国家自我认知与国家的物质性力量同等重要，国家身份界定国家利益的范围，识别国家威胁的来源，确定使用国家力量的方向，并激发使用国家力量的动力，否则国家的物质力量再强大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国家力量看成是强风，那么国家身份就是天气风向标，告诉我们风往那个方向刮。”^①

威尔逊在一战前后对美国国家身份的塑造实际上就起到为 20 世纪的美国提供风向标的作用。他试图告诉美国人，在美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和对外部世界依赖日深的新形势下，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美国作为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为崛起的美国勾画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自由卫士”和“世界领袖”，实现了新形势下美国自我认知的转变。威尔逊竭力塑造的美国国家特性和国际角色虽然在 20 年代共和党执政时期遭到一定程度的拒绝，但在 40 年代之后为美国社会普遍接受，成为 20 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对美国自身及其国际角色的理解。威尔逊对美国存在意义的阐述和国家身份的重塑对 20 世纪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威尔逊对美国自我形象和国家身份的重塑改变了美国人对国家利益的理解，美国开始把积极“促进民主”和“捍卫自由”视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道德责任。这一思想成为“威尔逊主题”，一直影响着后来的美国外交政策。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的几乎每位总统都把威尔逊主题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美国国内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践行“威尔逊主题”和实现威尔逊的理想，而不是威尔逊的理想是否值得追求以及是否为美国在动荡的世界上应对各种挑战提供指导。无论是民主党总统还是共和党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都声称是威尔逊主义者，连最不像威尔逊的尼克松也自称是威尔逊的信徒。近百年来，不断有批评者们指责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把美国外交引上错误的方向，无助于在一个复杂的世界维护美国的利益，但是不可否

^① Henry R. Nau, *At Home Abroad: Identity and Powe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

认的是,在此期间威尔逊的原则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威尔逊主题”——美国负有在全世界“促进民主”和“捍卫自由”的责任从未受到挑战。用著名历史学家江昭的话说,威尔逊主义是“当代历史强有力的界定者”。^①

其次,威尔逊关于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角色定位常常促使美国筹划建立所谓的“国际新秩序”。在威尔逊的建构中,世界领袖的责任主要体现在领导国际社会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以维护世界和平,就像一战后筹划国联那样。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威尔逊之后的美国领导人。在20世纪的每次大战之后,美国领导人都会宣称要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无论是二战结束时的罗斯福、杜鲁门,还是冷战结束后的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而且美国筹划的国际秩序大多以威尔逊思想为蓝本,把所谓的促进“自由”和“民主”置于突出的地位,以理想主义的语言和道德辞令来描述美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角色。^②筹划和维护“新秩序”成为美国领袖角色的体现和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同时通过承担所谓维护“新秩序”的责任,美国深深地卷入国际政治之中。威尔逊对美国自我形象和国际角色的重塑使国际主义最终战胜孤立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调。^③

不仅如此,威尔逊在建构国家身份时所使用的修辞战略也为后来的美国总统所效仿。在威尔逊的公共话语中,世界被划分为善恶两大对立阵营:一方是美国代表和领导的、由民主国家组成的阵营,是“善”的和正义的力量;另一方是由专制与独裁国家组成的阵营,是“邪恶”的力量。前者接受上帝的指引,而后者则受魔鬼的驱使。国际关系就是两大阵营的斗争,即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善恶大决战。学者菲利普·万德称这种修辞战略为“预言式的善恶二元论”(prophetic dualism)。^④这种修辞战略暗示着善恶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邪恶力量的胜利就是正义力量的失败,也就是说,世界任何地方自由和民主的失败都意味着美国的失败,都会损害美国的安全,^⑤因此美国对任何地方出现的对自由与民主的威胁都应该加以抵制。这样,美国充当“自由卫士”的角色也就获得了正当性。二战后几乎每位总统都采用这种修辞战略来论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世界各地“捍卫”自由的必要性。杜鲁门在阐述“杜鲁门主义”的国会演讲中

① Akira Iriy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3, *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 1913-194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2.

② 例如,乔治·布什总统1990年9月在就海湾战争向国会发表的演讲中说:“在这不同寻常、独一无二的大变动的关头”,“美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可替代的”,美国必须继续领导世界。而作为世界领袖的“责任”之一就是开辟一个“新时代”,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在新的世界里,“法治原则取代丛林原则”,“各国共同承担促进自由和正义的责任”,“强者尊重弱者的权利”。他称美国的将士们“正在与阿拉伯人、欧洲人、亚洲人和非洲人一道为捍卫原则和世界新秩序的梦想而战”。George Bush, “The Persian Gulf,” Delivered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September 11, 1990,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vol. 56, no. 24 (October 1990), pp. 738-741.

③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20世纪逐渐走上世界舞台,特别是在二战后全面干涉国际事务并非仅仅因为美国人接受了威尔逊对美国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的界定,单凭理想主义的话语并不能说服美国人放弃孤立主义。现实主义考虑,包括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的对权势、利益和荣耀的追求,无疑也是促使美国积极卷入国际事务的重要动力。在一些历史时期,美国表现出的权力傲慢和利己主义甚至超过威尔逊所鄙视的“老欧洲”。笔者无意否认这一点。但这方面的内容与本文主题无关,故未详加讨论。

④ Philip Wander, “The Rhetoric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Martin J. Medhurst, et al., eds., *Cold War Rhetoric: Strategy, Metaphor, and Ideolog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0, pp. 153-184.

⑤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就有类似的话:“在目前两极权力格局的背景下,任何地方自由制度的一次失败都是整个自由制度的失败。”FRUS, 1950, vol. 1, p. 240.

对“自由”和“压迫”两种生活方式的划分，^①里根的“邪恶帝国”论^②都使用了“预言式的善恶二元论”，具有鲜明的威尔逊式修辞特征。乔治·W.布什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也使用威尔逊式的语言把世界划分为由专制国家（指朝鲜、伊朗和伊拉克）及其恐怖主义盟友组成的“邪恶轴心”和美国领导的自由力量两大阵营，并称“上帝就在我们身边”。^③美国领导人的这些措辞固然深植于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反映了宗教（特别是清教）观念和宗教生活对公共话语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首先是威尔逊开启了这种语言风格和修辞战略。

如果把西奥多·罗斯福外交思想的命运与威尔逊主义的深远影响相比较，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威尔逊重塑美国身份所具有的意义。西奥多·罗斯福也是带领美国走出孤立的重要人物，但他主要以地缘政治和维护均势的需要说服美国人卷入国际政治，与威尔逊诉诸美国理想和国家身份截然不同。一战爆发后不久，罗斯福就呼吁美国应该重整军备，必要的时候加入协约国方面作战，他给出的理由是维护欧洲均势，以防止德国在获得欧洲霸权后染指美洲，威胁美国的安全，但罗斯福的呼吁没有得到任何回应。^④反而是威尔逊以截然不同于罗斯福的理由带领美国走出孤立，实现了罗斯福让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的目标。而且，尽管罗斯福可能远比威尔逊深谙国际政治之道，但罗斯福的外交思想和国际政治谋略却很少被后来的美国领导人所提及。典型的例证是，理查德·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与西奥多·罗斯福非常相像，其国际谋略实际上体现了罗斯福的均势外交思想，但尼克松却以威尔逊主义的传人自居，经常使用威尔逊式的语言和论调，并在他的白宫会议室内悬挂了一幅威尔逊的战时肖像。这是相当耐人寻味的。

基辛格对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外交思想在20世纪的命运曾有过这样一番评论：

就成熟的治国方略而言，在这两位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当中，罗斯福的主张显然高明得多，但是，占优势的却是威尔逊。一个世纪之后，罗斯福的成就固然没有被忘记，但却是威尔逊塑造了美国的思想。罗斯福明白国际政治在当时参与世界事务的国家之间是如何运作的——他是对国际体系的运作最有敏锐洞见的总统。但是，威尔逊把握了美国动机的主要动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美国不能把自己看做与别国一样的国家。……无论权力的现实

① 杜鲁门1947年3月12日在国会的演讲中声称：“在当前世界历史关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做出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其特点是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和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第二种生活方式以把少数人的意志用武力强加给大多数为基础。它依赖于恐怖和压迫，对新闻出版和广播的控制，操纵选举和对个人自由的压迫。”而“无论是通过直接侵略还是间接侵略，将集权主义政权强加给自由国家的人民都削弱国际和平的基础，因此也破坏了美国的安全”。美国的政策“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制武装起来的少数人和外来的压力企图强加给他们的奴役”，“支持自由人民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种表述与威尔逊的修辞非常相似。Henry S. Commager,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2, pp. 705-706.

② 1983年3月8日里根在福音派信徒全国协会年会上的演讲集中体现了这种语言风格。他称美国的“自由实验”代表着“人类最后的最佳希望”，而苏联则是“邪恶帝国”，是“现代世界罪恶的渊藪”，对苏联的任何“绥靖”都是“对美国历史的叛卖”，并将“让自由失去机会”。该演讲被称为“邪恶帝国演讲”并广泛流传。Speech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at Orlando, FL, March 8, 1983. <http://www.nationalcenter.org/ReagonEvilEmpire1983.html>. (2008年12月4日)

③ President Deliver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9, 2002. <http://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2008年12月10日)

④ 西奥多·罗斯福自己也意识到他的理由无法说服民众“追随”他，美国人对他的想法没有“好感”。参见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p. 42-43.

和教训是什么,美国人始终不变信念一直是,美国独一无二的特性在于实践与传播自由。

只有与美国独一无二的自我认知相吻合的理想与远见才能促使美国采取伟大的行动。无论罗斯福的道路在理智上如何符合大国外交实际操作的方式,都无法让他的同胞相信,美国需要加入一战。反而是威尔逊用崇高的道德言论打动了美国人们的情感,尽管外国领导人对这些言论相当难以理解。^①

威尔逊远比西奥多·罗斯福更了解美国人的心理和情感,知道如何打动美国人民,利用美国例外的观念和理想主义信念把美国塑造成“自由卫士”和“世界领袖”的形象,以此激励美国人,一步一步地把孤立主义的美国带向世界舞台。威尔逊塑造的这一新的美国形象与角色也因为深深地根植于美国的传统而被广泛接受,从而获得了经久的生命力。

尼克松的外交具有与西奥多·罗斯福相同的命运。尼克松是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第一位主要以国家利益和均势原则为指导推行外交政策而较少侈谈美国道德理想的总统,但是这种处理外交政策的方式却遭到猛烈的抨击,并导致对苏“缓和”政策的短命。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与美国的自我认知和国家身份相矛盾,不能触动美国人的心灵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无法在一个被灌输了美国例外论,并坚信自己国家承担着“捍卫自由”神圣使命的美国人民中间激发出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用学者沃尔特·艾萨克森的话说,尼克松一基辛格外交遭遇挫折是源于他们对“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历史基础”的人权、民主等“理想主义价值观”“麻木不仁的态度”,也即“地缘政治算计的非道德性”。^②在美国社会,非道德的地缘政治算计因严重背离美国的自我形象通常不会得到普遍的支持。

而只有与美国“自由卫士”形象相一致的政策,只有大谈美国理想和道德责任的总统才会得到拥护和爱戴。就此而言,罗纳德·里根比尼克松幸运得多。在冷战时代与威尔逊在思想和语言上最相近的总统是共和党的里根。用基辛格的话说,里根虽然对国际关系运作的理解相当肤浅,他却“较好地掌握了美国人心灵的运作”,“与威尔逊一样,里根明白美国人民在历史上一直是在例外论的鼓声引领下行进,在历史理想中,而不是在地缘政治的算计中找到最终的启示与鼓舞”。^③同威尔逊一样,里根在日常外交活动中大谈美国的理想、身份和角色,称美国是“例外的”,上天指定美国做世界和平与自由的“捍卫者”,而苏联(像威尔逊眼中的德国)则是“专制”和“集权的”,因而是好战的,是自由的天然敌人。^④里根对美国制度和理想的歌颂,对苏联的道德讨伐(如称苏联为“邪恶帝国”),甚至超过威尔逊对德国的谴责。里根的外交政策受到广泛赞誉,被认为重新把美国的外交置于崇高的道德理想基础上,并成功地瓦解了苏联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他本人也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毫无疑问,20世纪的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梦想、角色与抱负主要体现在威尔逊的理想中。如果说杰斐逊对美国精神的阐发构成美国的立国原则,塑造了19世纪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存在意义的理解的话,威尔逊对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则改变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理想、抱负和使命的理解,主导了20世纪美国人对美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为崛起的美国确定了长远的国家政策走向。他所建构的超越不同的族群利益和诉求,为所有族群都认可的统一的国家身份成为20世纪美国大国外交的基础。威尔逊的出现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是一

①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p. 44.

② 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2, p. 766.

③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p. 767.

④ 参见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86.

国领导人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国家的国际角色和外交政策的极为少见的例子之一。可以说，所谓“美国世纪”在外交领域实际上是“威尔逊的世纪”。

五、结 语

威尔逊通过重塑美国国家身份与自我理解，把美国带入建国之父们极力躲避的凶险的国际政治之中。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一直为威尔逊所塑造的美国自画像所陶醉，并据此来筹划自己的政策和行动。通过到国外寻找“恶魔”，即所谓自由的敌人加以消灭，美国固然保卫了自己的安全，但另一方面也像亚当斯担心的那样，卷入了“自私”和“贪婪”的阴谋与战争之中，不仅践踏了其他国家的自由与权利，给世界带来了种种灾祸，实际上也损害了自身的自由。冷战时期尼克松政府对权力的滥用和伊拉克战争期间乔治·W. 布什政府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和人权的践踏都险些让美国“失去自己的精神”，证明了威尔逊塑造的新的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的危险性。

归根结底，美国自绘的“自由卫士”与“世界领袖”形象实际上是相当虚幻的，它固然可以让自己陶醉，但却无助于美国正确处理日益复杂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在其他国家看来，所谓“自由卫士”和“世界领袖”的自画像多半是掩人耳目、自欺欺人的招牌，其背后是对自私国家利益的追求和对其他国家内政的粗暴干涉。美国需要承认自己是一个与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两样的国家，美国的实力或许强大，但它既不是上帝选定的“自由卫士”，也不具有超凡脱俗的美德，更没有与生俱来的领袖禀赋。与其他国家一样，它既追求自私的国家利益，也渴望权力和荣耀，因此并不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伟大，而至多是一个好坏兼具的榜样。承认这一点对美国人来说可能会很痛苦，但却非常必要。它可以使美国少一点妄自尊大和自命不凡，而多一些对其他国家声音的倾听和命运的同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威尔逊辞世近一个世纪之后，美国似乎需要再一次重新定义“美国”，重塑自己的国家身份与自我形象，以适应全球化时代世界权力格局急剧变动的现实。

〔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姚玉民）

Soviet relations. Although a lot of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is issue, much of it remains descriptive due to a scarcity of original materials. The dispute over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Incident cannot be simply attributed to rights to the railway, or to concerted anti-Soviet action by the imperialist powers. Rather, the incident was a consequence of a variety of factors, such as conflicts in the system of joint Sino-Soviet management, geopolitical factors and errors in Chinese policy-making. After the incident, all the power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tried to exploit the incident to serve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Nanjing government hoped that the Western powers would support China, while the Soviets predicted an anti-Soviet union by the Western powers. In the event, neither scenario eventuated. The only true beneficiary of the incident was Japan, which was not a party to it.

Restriction or Promotion? Charters and Commerce in Medieval Europe

Zhao Lixing (101)

The scholarly literature generally holds that the charters granted to markets and cities in medieval Europ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which in turn contributed to the demise of feudalism.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value judgment exaggerates the role of charters an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ommerce and feudalism*. In fact, *commerce was always an important part of feudalism and the feudal economy*. Granted in a top-down process by kings and rulers, charters simply provided som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rade. Their purpose was to restrict commercial activities within a certain range. That is to say, the so-called “promotion” of commerce was premised on its restriction.

Was Erasmus Duplicious: A Case Study of Erasmus' Six Years in Freiburg

Wang Tao (114)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ist Erasmus and the religious reformer Martin Luther has never been clearly delineated. Our case study of Erasmus' later years in Freiburg reveals the true character of this famous humanist and on this basis discusses his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us reforms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throwing light on his differences with Martin Luther on religious reforms and humanism. Hopefully, it will contribute to settling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issues that existed between religious reforms and humanism.

Who are we? Woodrow Wilson,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Wang Lixin (127)

In the new context of the r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 Woodrow Wilson seized the exceptional opportunity of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WWI and wartime mobilization to

reinterpret America's tra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contrasting them with Germany, the "other". He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America's self-image and international role from the "model republic" and "exemplar of freedom"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at of a "guardian of freedom" and "world leader." Wilson's reshap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not only facilitated wartime mobilization but also resolved America's identity crisis and its confusion about the role it was to play after its entry onto the world stage. In so doing, he identified the long-term direction of national policy. His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s ideals, role and destiny led his countrymen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their country's existe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and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This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Theories

On the Problem Field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Li Jie (152)

What is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studies and what is their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alities of current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ethod and value judgments and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ethod and the meta-narrative of history. We thereby aim to demonstrate the efficac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y and Historians

Xia Nai, Father of Egyptian Studies in China

Yan Haiying (167)

Research Notes

An Error Correction of the Ranks of Third-Grade Warrior Officials in the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Liu Yingsheng (174)

On the Tuition Fees of V. K. Ting's Study in Great Britain

Li Xuetong (181)